

略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价值观

万 健 琳

[摘 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批判异化消费为出发点,通过阐述生产、需要、消费、生态、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指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劳动与异化消费的关联性,主张通过社会结构变革和价值观重塑的双重变革来消除异化消费现象,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消费价值观。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价值观对于我们建构符合生态原则的绿色消费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异化消费; 虚假需要; 消费批判; 制度批判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8)06-0691-05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价值观,是在对生态危机形成根源的深入分析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作为重要的分析工具和中间桥梁,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和政治制度联结起来,最终使对生态危机的批判转化成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并以此为基础勾画出了社会发展的新形态。

—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消费”作为联系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桥梁,构成了其理论演进的重要基础。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趋势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因此,需要对异化消费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才能揭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本质和根源。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异化消费是异化劳动合乎逻辑的对应现象。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因而使人们逐渐变得越来越依附于消费行为。正如本·阿格尔所说,“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1](第 494 页)具体而言,人们在单调、乏味、无聊的工作中,无法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因而不自由的。于是人们便把注意力转向了消费领域,试图通过消费行为来补偿劳动中的这一不足。因为在消费领域里,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任何想要的东西,人可以作为一个积极的主体参与其中,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因而仿佛是自由的。在异化的条件下,消费变成了人们逃避劳动痛苦和不幸的避难所,幸福被等同于消费,幸福的大小则取决于消费物品的价值和数量。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消费成了一种病态行为,一种对物品的无度索取和占有。世界上的一切,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都进入了人的消费范围,成为人的消费对象。然而诡异的是,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消费更多、更新和更好的商品和服务,人们只能通过更高强度的异化劳动来获得更多的金钱,从而满足自己永无止境的欲求。因而,在当代,消费异化已成为各种异化的集合点:在经济上,它与劳动异化互相支持、互相促进,成为劳动异化得以继续存在并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政治上,它消解了人们的斗争意识,增加了人们对制度的合法性认同,从而支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无限生产、异化消费和虚假需要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无限生产是最初的推动力和源泉,虚假需要和异化消费既是其结果,又是从内外两个方面形成新的推动力,它们以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作为支撑,互相推动、交融并进,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生存的动力。具体而言,在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动力的推动下,为了防止生产出现“过剩”,维持资本的继续增殖,消费变成了新的生产力。消费成为生产和销售的唯一目的,生产者的利益在于最大限度地提高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地将奢侈品转化为“必需品”。此时的生产不但为利润而制造消费品,而且还必须同时为利润而创造需要。需要不再是源于人的内心,而是变成完全由外部制造出来的虚假的东西,消费成了需要满足的唯一方式,并变异为生产扩张的内在动力。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也是最系统地论述异化消费与异化需要的是莱斯。他在其著名的《满足的极限》一书中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的“虚假需求”和“异化消费”观点,尖锐地批判了现代工业社会把需要的满足等同于无休止的消费的观念。莱斯认为,我们必须把人的需求问题看作是生态相互作用的更大系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指出,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的需要被系统地导向了商品消费领域。人们在快速变化的商品和服务中不断地重新定义他们的需要,并且用不断增长的消费来补偿其他生活领域,特别是劳动领域遭受的挫折,并最终将消费与满足、幸福等同起来。然而,数量众多的新商品,在承诺满足需要的同时也相对从前的商品提升了不满足的感觉。需求和商品之间快速的相互作用带给个人的是一系列持续变化的满足和不满足感。换句话说,“这样的社会被经济层面上激增的财富与个人层面上的匮乏的体验之间的永恒矛盾所困扰。无论多么勤勉地或多么成功地寻找到不断增长的资源和能源的供应,也不能解决这一矛盾。”^[1](第 32 页)总之,对商品的疯狂消费并没有使人变得更快乐,反而变得更痛苦和迷惑。因此,他强调,对于这种传统来说,最重要的是改变表达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式,在消费领域以外的其他活动领域如生产领域中寻找人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本·阿格尔认为,理解社会变革运动背后的、在解决严重制度危机过程中产生的基本原理来说,需求理论是必不可少的。而所谓的异化消费的特征就在于:“(1)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以广告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2)人们把关注于消费当作满足需要的唯一源泉。”^[1](第 495 页)为了不断刺激人们去消费,资本借助了广告这一强有力的工具,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以广告为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同时人们则把需要的满足几乎完全等同于了消费。然而,人的需要是无止境的,但无止境的物质王国则是不可能实现的。随着能源和物质资源的成本不断上升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永远过着物质富裕的生活的期望必然会破灭,而这又将促使人们审视自我的需求和价值观,反思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于是,变革的力量将在这种被阿格尔称之为“期望破灭了辩证法”中应运而生。

总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消费现象及其后果的批判为基础,通过揭示生产、消费、需求、商品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最终找到了异化消费及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将消费批判纳入到了其制度批判的体系之中。

二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重视对消费问题的研究,不仅因为其是造成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通过对消费实行操纵和调节,大大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而这正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批判的重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对消费的控制过程及其造成的社会和生态后果,他们将异化、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认为异化和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应有的逻辑所致,从而将消费批判与制度批判结合起来。这也成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绿色政治思潮区分开来的根本标志。

他们认为,异化消费在马克思所在的时代不曾出现,它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国家为了防止经济危机普遍实行干预和调控的背景下产生的。资本主义已设法将经济危机的趋势转移到消费领域,正是通过对消费实行操纵和调节,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从而延缓了

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

首先,无限生产与异化消费互相促进,通过大量消耗商品和服务,为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而这正好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必需的,它为资本主义再生产,为维持较高的利润率、转移经济危机创造了条件。福斯特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资本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主要是为了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其生产出来的产品不是为了实用的需要,而主要是为了满足由市场力量所产生的那些虚浮的消费需要。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的利润增长和扩张需要,厂家不断制造出新奇的物品和服务,并通过广告和文化灌输等手段不断地制造虚假需求,迫使人们不断地购买、不断地消费,从而大大增强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依赖性,稳固了资本主义统治的经济基础。

其次,消费异化掩盖了社会的差别和矛盾,瓦解了人们的斗志,从而增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这是异化消费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现代主体作为一个消费者,无论是他的需求还是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都是由资本主义商品体系结构性地规定了的。因而,人们一旦陷入了物质至上的“虚假需要”,便会把自身的需求与商品体系“一体化”。这种一体化集中表现为“需求的一体化”,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延续和发展,需要大量消费它所生产的产品,现在它成功地把这种需求转化为普通人自身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变成了个人本能的需求。这种需求的一体化又产生了利益的一体化,一旦个人把自己的需求与商品体系结合在一起,他们便不再能否定这一体系,因为这无异于否定自身,这样他就彻底失去了挑战既定社会秩序的能力。这一动态过程使现代资产阶级找到了新的统治合法性依据,统治者通过向个人提供几乎是源源不断的商品,不仅使统治者、资本家过着丰裕的生活,而且使工人和他们享受着看起来同样的产品和服务,工人阶级在平等的假象中被同化和融合了,对这个制度的反抗要求消失了,统治者通过对消费实行控制成功地延长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寿命。

然而,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和有限的生态系统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矛盾冲突。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产的无限增长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预示着人类资源极限的快速到来,以及生存环境的无可逆转的破坏。因为消费经济是以现代工业和技术为发展基础的,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无止境的物质欲求,它专注于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不断地向“自然界”透支,其结果是人类将为维持这种增长方式和生活方式所造成的环境、能源和生态后果支付必要的代价。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这种经济无限增长模式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给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它们便因此成为了资产阶级极力倡导的“理想类型”,从发达国家辐射到发展中国家,进而成为了全球所公认的最佳发展模式。“不消费就衰退”成为了当今社会似乎无懈可击的道德逻辑,消费甚至成为了当代社会的一项公民义务。然而,地球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当今世界,充其量只占全球人口1/5的工业发达国家消费的原料、能源及其它资源占世界产量的4/5,如果把这些国家所具有的人均资源、能源消费水平推广到全球所有居民,将对自然环境产生巨大压力,以至于造成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因此,“正是在发达国家中被不同程度地制度化,并通过经济高压和意识形态灌输在其它国家被提升为普遍理想的高集约市场秩序的社会实践,要为对地球上可利用资源的严重剥夺负责;为依赖于能源密集型的农业而生活的人类现在的生存状况而负责;为向生态圈排入大量的有毒物质而负责。”^[3] (第100页)

由此可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直主张将异化、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异化和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应有的逻辑所致,因而要克服这种异化和危机就必须粉碎这种逻辑本身。他们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特性,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与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之间的必然联系。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具有双重矛盾,其中第二重矛盾是指生产力、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其原因在于,资本的本性是追求无限的经济增长,必然不断地进行自我扩张,但是自然界本身是无法进行自我扩张的,这就意味着追求无限增长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必然会受到生态制约,造成自然环境的破

坏和生态危机。因此,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性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生态上具有不可持续性。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中则用“物质变换裂缝理论”来说明这种必然性。“物质变换裂缝”就是指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以追求利润为基础的掠夺式生产方式,其结果必然会造成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过程的中断,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一书中,福斯特更加明确地肯定生态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本·阿格尔则通过阐述当代资本主义维系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变化,来揭示生态危机的必然性。阿格尔指出当代资产阶级通过向人们许诺提供不断增长的财富和商品,并控制和引导人们的消费需求,使人们沉溺于商品消费之中,从而维系了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具有不断扩张的趋势,进而产生生态问题。

三

关于如何消除人的异化(包括异化劳动、异化需要和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的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从生产和消费(需要)两方面入手,从经济运行和制度框架两个层面着眼,通过社会结构变革和价值观重塑的双重变革,创造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和人的异化问题。

莱斯在《满足的极限》一书中,着重论述了这种摆脱异化和危机的途径问题。他认为尽管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但人的能力也是多方面的,人的多方面能力的发挥与人的真正满足和幸福是一种正相关关系,人的多方面的能力完全可以满足人的多方面的需要,根本用不着非要由过分专门化的商品和服务来提供。因此,我们需要把注意力从消费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创造出一种能促进人们在其中直接参与与满足自己需要有关活动的环境。他主张通过非等级制的、以全体为基础的联合体结构来组织劳动,使每个人在自由和自主的条件下决定自己的需要,使每个人的能力都得到全面实现,使一切个人的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真正满足具有丰富的意义,由此实现表达需要和满足需要方式的彻底变革。

在制度层面,他通过批判地分析穆勒的“稳态国家”思想和伊利奇的“交往社会”等传统替代方案,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替代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即把工业发达的各个国家的社会政策综合在一起的社会,其目标是减低商品作为满足人的需求的因素的重要地位和把按人口平均计算需要的能源及物质减到最低限度。”^[2](第 112 页)他同时强调,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有力的动态阶段重新改变社会政策,使其抛弃幸福的量的标准,而采用质的标准;它并不总是以增长、稳定或下降的经济形势为特征,而更迫切的是重新配置资源和改变社会政策的方向,使满足需求的问题不再被完全看作是消费活动的功能。在这个社会中,有一系列消除贫困的相关政策,不会让人们回到过去那种以穷乡僻壤为特征的艰苦环境中去;在这个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商品和市场交换,只是消费不再是满足需要的唯一方式,人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拥有选择权;在这个社会中,仍然需要科学技术并享受其成果,只是科学技术也由集中化、垄断化的使用方式走向分散化。

阿格尔则明确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是双重的。它要设计打破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社会主义的未来。过度生产将通过分散工业生产和降低工业生产的规模来克服;过度消费将用向人类提供有意义的、非异化劳动(这种劳动是小规模的、民主管理的生产者联合体的劳动)的办法来克服。”^[1](第 420-421 页)他认为变革的希望就蕴含在“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中,这种辩证法指的是: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丰裕的时期,本以为可以真的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危机,而这不管愿意与否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满足方式从根本上重新进行评价。他特别指出,“这一过程一般具有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步骤:(1)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无限增长,从而将需要缩减旨在为人的消费提供源源不断商品的工业生产;(2)这种情况将需要人们首先缩减自己的需求,最终重新思考自己的需求方式,从而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耗的观念;(3)对需求方式的这种重新思考可以使异化消费变成我们称为‘生产性闲暇’和‘创造性劳动’的现象。”^[1](第 497 页)人们将不再把这种劳动看作是获得应用于未来消费的财富的源泉,而可以在生产活动中实现自己的愿望和价值

阿格尔进一步提出,要用“分散化”、“非官僚化”和“工人管理”等具体措施来克服异化消费及生态危机。他指出,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既适用于技术(生产)过程又适用于社会和政治过程。通过使现代生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我们就可以保护环境的不受破坏的完整性(限制工业增长),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从性质上改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他认为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是两个相伴而生的概念,“凡在有技术分散化形成小规模技术的地方,劳动过程的民主化都起因于工业组织的非官僚化。离开了一个就没有另一个。”^[1](第 503 页)另外,通过对南斯拉夫的工人管理和工人自治的经验考察,阿格尔提出应把强加的资本主义控制转变为自我施加的工人管理。他进而提出小规模、非官僚化、集体组织的生产将成为目的本身,而这些只有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同时具有必要性程度的非官僚化)的制度下才能实现,从而最终将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双重目标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目标联系起来,形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福斯特也同样既强调社会变革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树立生态道德的重要性。在个体的道德方面,福斯特强调应当摒弃自 15 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兴起以来以“支配自然”为核心的道德价值观,重新建立一种新的生态道德价值观,引导我们重新学习在地球上如何居住,最终把自然看作是人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在社会变革方面,他认为环境运动应该选择一种以人为本和生态协调,特别是以满足穷人基本生活需要以及确保生态长期安全的新的社会形态,保证环境公平。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消费价值观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以对异化消费的批判为出发点,通过阐述生产、需要、消费、生态、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找到了异化消费及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将消费批判纳入到了其制度批判的体系之中,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替代性的社会方案——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因而,相对于其他的西方绿色政治思潮,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消费和生态问题的分析更加深刻也具有更强的革命性。本·阿格尔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恰恰因为它是从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中来寻找挥霍性的工业生产的原因,它并没有忽视阶级结构。”^[2](第 402 页)只有把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才能真正理解其理论的特质和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加]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2] Leiss, William. 1988. *The Limits of Satisfaction*. Ithaca: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 严 真)

Ecologic Marxism: Consumptive Value

Wan Jianlin

(School of Humaniti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Law, Wuhan 430073, Hubei, China)

Abstract: Ecologic Marxism started with the critique of alien consumption, expatiated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roduction, need, consumption, ecology and institution, and finally found ou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lien labor and alien consumption. They insisted that the alien consumption could be eliminated by the double innovation in social structure and value reconstruction and consequently create the characteristic theories of consumptive value.

Key words: alien consumption; false needs; critique of consumption; critique of institutions